

蘇聯變局對中共之衝擊

洪茂雄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兼國際共黨組副召集人)

一、前言

一九八五年三月，戈巴契夫就任蘇共總書記以來，由於他揭發「改造」(Perestroika)和「公開性」(Glasnost)政策，在這種獨具創意的新思維衝擊下，僅僅四、五年光景，非但震撼整個共黨世界，引發一連串結構性的變遷，而且也對戰後形成的秩序產生連鎖反應，導致東西方長達半個世紀的冷戰宣告落幕。所謂「戈巴契夫震撼」最引世人矚目者：首先，諸如東歐各國掌權長達四十多年的共黨紛紛改頭換面，不僅承認過去所犯錯誤，要與歷史劃清界線外，同時還能順應民主潮流，舉行戰後首次自由選舉，把政權拱手交給昔日屢遭迫害的異議份子所組成的政治團體。其次，舉凡東西德的統一，華沙公約組織和「經互會」的解體，東西方長久對抗的態勢，時來運轉，走向合作，並加速裁軍的腳步，使戰後列強建立的歐洲秩序，又邁向新的里程。在這樣劃時代的轉變，至少說明了下列三點事實：其一，把所謂的「社會主義國家」推入歷史的灰燼裏，東歐國家的政經體制完全改變，正朝向民主國家邁進。其二，共產黨能體察民心歸向，沒有重蹈北平天安門血腥鎮壓的覆轍，毅然放棄「一黨專政」和馬列主義而轉換體質，徹底更新原有結構，以適應時代所趨。其三，戈巴契夫的「改造」運動除了改變歐洲面貌之外，就是蘇聯本身也面目全非。蘇聯和蘇共一向被視為「社會主義祖國」與「共產黨之母」，亦難逃厄運，壽終正寢。

正當八〇年代和九〇年代交替之際，東歐各國「非共化」的勢頭，猶如骨牌效應一般，即使共產黨擁有天羅地網極為嚴密的特務系統，也無法抵擋得住洶湧澎湃的民主浪潮，落得苟延殘喘而靠邊站。當時有不少西方學者針對蘇聯的政局發展，大發議論，從歷史、文化和政治、經濟等主客觀條件的分析，認為東歐國家與蘇聯的環境迥異，在蘇聯發生「非共化」的可能性不大。^①可是，事實勝於雄辯，蘇聯也同樣引起驚天動地的劇變，人民的力量不但使裝備精良的戰車屈服，同時也迫

註① *Osteuropa*, Nr. 3/91, März 1991, pp. 218~235.

使擁有一千六百餘萬黨員的「共產黨之母」宣告解散。②國際共產演變至今，還剩下一個令國際社會關切的問題，即中共會不會受到波及？下一個「亡命之黨」該是輪到中共呢？或北韓？抑或越南、古巴？

本文的主旨，擬就歷史面和現實面來觀察，究竟蘇聯變局對中國大陸產生多大程度的衝擊？中共面對和平演變的壓力，又將何去何從？另外一個值得國人深思熟慮的課題，要是中國大陸有一天真的發生了和平演變，那麼該如何採取因應之道。本文擬針對以上諸問題略予剖析。

二、蘇聯歷史上重大轉變的特徵與影響

如果從蘇聯歷史上幾次重大轉變的經過，就其特徵與影響加以比較對照，的確很容易找出某些論證，來幫助本文主題的瞭解。茲將一九一七年布爾什維克革命以後，蘇聯四次重大轉變之性質、特徵及其影響，列表如下：

表一 蘇聯歷史上重大轉變的特徵和影響對照表

演變性質	時間	主要特徵	重大影響
布爾什維克革命（十月革命）	一九一七年	△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沒收私有財產。 △推行新經濟政策——五年計劃。 △一黨專政，迫害異己。	△成立「共產國際」，企圖赤化世界。 △世界各地共黨紛紛成立。 △一九二一年中共創黨。 △一九四五年以後，東歐淪入鐵幕。 △一九四九年中共在中國大陸取得政權。
赫魯雪夫推動改革運動	一九五六年	△清算史達林，批評個人偶像崇拜。 △以利潤動機進行農業改革。 △工業行政體系由中央集權制改為地方分權制。	△波蘭、匈牙利先後發生反共抗暴事件。 △中國大陸「新五四運動」。 △中蘇共理論鬥爭，關係惡化。
戈巴契夫推動「改造」運動	一九八五年	△倡導「透明度」，促進社會多元化。 △政治和經濟改革同時進行。 △放棄「一黨專政」。 △平反史達林統治時代以來的冤屈，還其清	△升高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 △掀起東歐民主化浪潮，導致全面「非共化」。 △共黨紛紛改頭換面。

註② 至一九八六年一月統計，蘇共共有黨員一千九百餘萬人。最近五年來，已減少三百萬人之多。

「八月革命」	一九九一年		
		白。 △民族主義和分離主義的風浪升高，糾紛不斷。 △改革派與保守派鬥爭，經濟改革方案無法落實。 △保守勢力發動軍事政變，遭人民和軍方抵制，宣告流產。 △加速民主腳步。 △中央權力下放，各加盟共和國地位上升。 △重新調整權力結構與聯盟體系。 △禁止共黨活動，沒收共黨財產。	△東西德完成統一，東、西方冷戰落幕。 △解散蘇共，共青團組織也隨之瓦解。 △波羅的海三小國正式獨立，脫離蘇聯。 △「人代會」通過人權法案。 △金邊共黨改名，柬埔寨和平進程再向前推進。 △國際共運「新四人幫」：中共、北韓、越南、古巴愈感孤立，對「和平演變」坐立不安。 △蘇聯停止對越南、古巴、北韓等國經援，使這些國家陷入困境。

由上面對照表觀之，自一九一七年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革命成功之後，蘇聯內部幾次重大變革，都對鄰近國家帶來相當深遠的衝擊。具體言之，這種衝擊反映下列幾個特點：

第一，位處蘇聯的周邊國家首當其衝，影響最大。從一九一九年三月「共黨國際」(Comintern 又稱「第三國際」)在莫斯科成立開始，無論是共黨的崛起，或奪權赤化，或放棄「一黨專政」和馬列主義，位於蘇聯的鄰近國家均受到衝擊，茲舉二例為證：其一，信奉馬列主義的政黨陸續建立，芬蘭共黨、匈牙利共黨(一九一八年)、南斯拉夫共黨(一九一九年)、外蒙人民黨、捷克共黨、羅馬尼亞共黨(一九二一年)等先後成立。除芬共外，其他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取得政權。其二，戈巴契夫的「新東歐政策」放棄布里茲涅夫主義，加速了東歐國家的民主化進程。一九八九、九〇年間，東歐各國(包括外蒙)在民主浪潮的席捲下，除了大幅修改史達林模式憲法，變更國號外，幾乎所有的共黨都改頭換面，拋棄馬列信條和革命政黨的屬性，轉換為中間偏左的社會黨。^③

第二，蘇聯每次重大轉變時，都一再引發國內和周邊國家內部的矛盾與對立。就以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成功為例，首先有所謂「白軍」與「紅軍」的對抗；隨後，共黨內部的權力鬥爭，列寧得力助手托洛斯基(Leo D. Trotsky)被整肅開除黨籍(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並強行予以放逐國外；新經濟計畫的主要策劃者布哈林(N. I. Bukharin)也難逃厄運，慘

註③ 洪茂雄，東歐變貌，台北，時報文教基金會，民國八十年五月，頁四、九。

遭殺害（一九三七年）。在中國方面，則有國民黨的清黨（一九二七年），隨後國共之間的鬥爭和「西安事變」的發生（一九三六年）等等。再者，以一九五六年的改革運動為例，赫魯雪夫的清算史達林，亦掀起鄰近國家內部矛盾的尖銳化。在波蘭和匈牙利就發生流血的反共抗暴事件；中國大陸出現「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所謂「新五四運動」，隨即展開「反右」整肅。以上這些例證，正足以說明，蘇聯內部的一舉一動，均對鄰近國家也會產生具有破壞性的「餘震」。

第三，都因經濟發展面臨嚴重困窘，不得不改弦易轍，進行某種程度的改革。蘇聯除了布爾什維克革命之後徹底變更政經體制外，其他幾次大轉變，乃肇因於經濟發展呈現停滯狀態，尤其農業方面原可自給自足反而變成必須從國外輸入穀物，始能供應日常所需。戰後，幾乎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一味抄襲蘇聯模式，因而經濟發展遭遇同樣的困難。為此，五〇年代以來，東歐各國無不進行不同程度的經濟改革。其中所謂「匈牙利模式」的經濟改革措施最具特色。但直到八〇年代後期，布達佩斯當局依然無法克服社會主義體制的弊病。一九七八年中共也試圖學習東歐的改革經驗，正式倡導改革與開放政策。可是，衆所周知，北平政權正四面楚歌，陷入「堅持」與「開放」的兩難困局。

在上表中所列一九九一年的「八月革命」，應涵蓋二種定義。第一種所指的是軍事政變，八月十九日至廿一日由副總統亞納耶夫（Gennadii Yanaev）領銜的「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以戈巴契夫的健康狀況無法履行總統職務為由，企圖違憲，竊取政權。^④這次為時不到六〇小時的政變，如果成功的話，那麼所謂的「八月革命」可能會被視為蘇聯歷史上的一件大事。第二種定義，則指民主的大勝利，人民同心協力，紛紛站起來共同抗拒軍事干預，不到三天工夫就迫使政變流產。於此同時，戈巴契夫的復職，立即採取一連串果斷措施，宣佈解散共黨，承認波羅的海三小國的獨立，重組聯邦體制，以及改組惡名昭彰的「國安會」等等曠世絕響的作為，^⑤而大大地加快民主化進程。本文所指的「八月革命」係屬後者，其對世局的影響程度，應可與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相提並論，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並且對世界的和平更具有正面意義。

綜上所述，從歷史面來觀察當前蘇聯的變局，很明確地可以得到下列結論：

其一，證明社會主義制度的徹底失敗。蘇聯實行這種制度長達七十年，儘管多次進行改革，但仍然無法克服不發達現象，到頭來連國內最起碼的民生問題，都束手無策，還得要仰賴資本主義國家的濟助。

其二，共產黨完全喪失民心，無力扭轉每況愈下的危機。本來東歐各國共黨政權的紛紛垮台，已反映共產黨人的窮途末路。如今蘇共這個世界上所謂「共產黨總公司」的老牌店也宣告倒閉，更說明共黨完全失去信譽，已被拋入歷史的垃圾堆之中，臭名永在。

註④ Der Spiegel, 7 Oktober 1991, pp. 196~205.

註⑤ Ibid.

其三，在社會主義體制下改革的極限性。從蘇聯和東歐各國的經濟改革經驗看來，因受意識形態框框的束縛，改革的空間極其有限，難有重大突破。所以，這些社會主義國家最終也得甘冒失去權力的風險，推行政治改革。但政治改革的代價，就是敲響共產黨的喪鐘，實現政權和平演變。

總而言之，蘇聯和東歐的變貌，是實行「一黨專政」社會主義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它不是突發事件，也不是所謂「資本主義」刻意挑撥離間所製造出來的。

三、中共領導階層對蘇聯變局的反應

當八月十九日莫斯科驚傳軍事政變，三天後宣告流產，戈巴契夫總統返回克里姆林宮復職，隨即戈氏宣佈辭去擔任六年的蘇共總書記，並解散蘇共中央委員會等一連串舉世震驚的消息傳出後，國際社會除了關切蘇聯未來的政局演變外，另一個引人矚目的焦點，則是中國大陸。一般最感好奇者，不外乎：其一，中共領導階層持何種態度來面對蘇聯這種劃時代的轉折？其二，中共會不會受到衝擊，淪為下一個瓦解的「祭品」？在此，本文試就某些現實面來解析這二個問題。如果把莫斯科軍事政變以後中共領導階層的反應，略予比較對照，很能夠幫助對上述二項問題的瞭解。茲將八月二十日至九月三十日這一個半月當中，中共高層政治人物所發表有關蘇聯變局的言論，舉其要者列表比較如下：

表二 中共領導階層對蘇聯變局談話對照表

談話人名或單位	時間	談話場合	主 要 內 容
1. 外交部發言人	8、20	外交部	蘇聯變化是內部事務，「中」蘇關係不受影響，將繼續發展。⑥
2. 錢其琛	8、22	接見蘇駐北平大使	尊重蘇聯人民選擇，蘇聯內部事務應由蘇聯人民自己處理。⑦
3. 楊尚昆	8、26	訪問外蒙時表示	蘇聯發生的事情，「中國」感到非常突然。「中國」自始至終的立場是，蘇聯發生的事，乃蘇聯內政。⑧

註⑥ 人民日報，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一日，第一版。

註⑦ 人民日報，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三日，第一版。

註⑧ 大公報（香港），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七日，第二版。

4. 中共緊急通報	中共中央辦公廳8、27發出	鄧小平於8、19和8、25召集高幹指示	現在國際間對中共的壓力增加了，蘇共的屏風作用沒有了，以後國際反共勢力的矛頭會直接對準中共，但中共不會把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公開化。中共仍繼續推行「五項堅持，五項反對」。 ^⑨
5. 「中共黨史研究」評論員	8、28	人民日報轉載	西方一部分敵對勢力的圖謀，已經在一些國家得手，或者在相當程度上得手了，應當估計到在這種條件下「中國」有可能承受比以往更大的壓力。 ^⑩
6. 外交部	8、28	發表聲明	對蘇共失勢作出正式反應，表明尊重蘇聯人民的意願，但未提及對社會主義前景的看法。 ^⑪
7. 李鵬	8、31	接受香港電視記者採訪	蘇聯急劇變化是國內和國際錯綜複雜因素造成，「中國」的基本態度是不管國際風雲如何變幻，「中國」將堅定不移走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⑫
8. 李鵬	9、9	接受義大利時代週刊採訪	「中國」對堅持社會主義充滿信心。歐洲實行社會主義國家的重大變化，是否會帶來繁榮或發展，還有待觀察。李鵬承認蘇聯的變化對「中國」會有一些影響。 ^⑬
9. 錢其琛	9、16	接受捷克記者訪問	有人認為「中國」也會發生像蘇聯國內所出現的情況，這一看法是沒有根據。不管蘇聯國內情況如何發展，對堅持獨立自主政策的「中國」不會有什麼大的影響。 ^⑭
10. 李鵬	9、18	會見歐洲議會訪問團	蘇聯和東歐的變化對「中國」有一些影響，但不大。因為「中國」和蘇聯的情況不同，「中國」按照自己國情進行建設，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⑮
11. 江澤民	9、23 、27	中共中央工作會議	嚴厲批判蘇聯領導人，指戈巴契夫為社會主義叛徒，葉爾欽為大俄羅斯沙文主義者（內部參考資料）。 ^⑯

註⑨ 明報（香港），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九日，第二版。

註⑩ 大公報（香港），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九日，第二版。

註⑪ 聯合報，民國八十年八月二十九日，第八版。

註⑫ 人民日報，一九九一年九月二日，第四版。

註⑬ 人民日報，一九九一年九月十三日，第一版。

註⑭ 人民日報，一九九一年九月十八日，第六版。

註⑮ 人民日報，一九九一年九月十九日，第一版。

註⑯ 中國時報，民國八十年十月廿八日，第十一版。

莫斯科於八月十九日發生軍事政變後，北平當局初步反應是，新華社於政變當天立即發回電訊，報導政變消息，人民日報並連續三天在第一版以大標題醒目刊登，但未加評論。^⑮不過，人民日報標題的遣詞用字極為曖昧，明眼人一目了然。如「蘇聯副總統亞納耶夫發布命令宣布」，然後以特大號字體「戈爾巴喬夫被停止履行總統職務」。另外，刻意凸顯某些字眼，如「支持緊急狀態委員會作出的決定」，「對葉利欽等縱容違法活動提出警告」。^⑯顯然地，政變之初，中共當局是多麼高興見到蘇聯政局的變化。至於香港親共刊物則以頭條整版篇幅來報導莫斯科政變後臨時政府的新方針。政變發生的第二天，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就蘇聯局勢發表談話，稱「蘇聯發生的變化是蘇聯內部事務」，「反對干涉別國內政」，^⑰沒有像西方國家對發動政變者予以嚴厲譴責，反應那麼強烈。到了八月廿二日莫斯科政變宣告失敗，中共媒體僅根據「塔斯社」的消息簡要報導，人民日報只在標題上引用「塔斯社播發蘇聯中央電視台報導」，然後用大號字體「戈爾巴喬夫宣布已控制了局勢」，並未正面報導軍事政變流產及策劃政變領袖下落的消息，也未加評論。^⑱其間頗值玩味之處，當八月廿二日莫斯科流產政變收場後，蘇聯駐北平大使索洛維耶夫向中共外長錢其琛轉達戈巴契夫口信時，錢氏竟無半句慰問之意，中共高層人物更噤若寒蟬，亦無一人致電慰問表示關懷。^⑲可見，無論中共的傳聲筒或領導階層對蘇聯軍事政變過程，都顯得十分尷尬，甚為心虛。

論及政變失敗後中共領導階層反應，從表二所列舉的主要觀點，基本上可反映如下共同特點：

其一，承認蘇聯變局「對中國有一些影響，但不大。」

其二，一再強調蘇聯與中國大陸的環境不同。

其三，指蘇聯變局是蘇聯內部事務，尊重蘇聯人民的選擇；但指稱政變為「事變」，並未對策劃政變主謀者予以任何批評。

其四，重申堅持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以別於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

根據中共內部流傳的一份文件指出，中共中央面對蘇聯的急劇變化也作了一番評估。北平當局對蘇聯政局發生變化的總趨勢上認為：由於戈巴契夫的一系列改革造成了蘇聯局勢的混亂，及社會的不滿。換言之，蘇聯放棄社會主義、蘇共瓦解和

註⑮ 人民日報，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二十一、二十二日，第一版。

註⑯ 同註⑮。

註⑰ 同註⑮。

註⑱ 同註⑮。

註⑲ 同註⑮。

蘇聯內亂，乃戈氏新思維模式改革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是各種矛盾激化的結果。^②至於蘇聯之所以發生政變，中共當局看法是，葉爾欽當選俄羅斯總統，戈巴契夫參加七國經濟高峰會議要求經援，美國總統布希訪問蘇聯，蘇共修改黨綱，宣布放棄馬列主義和各加盟共和國動盪不安等因素的累積，才促成政變的發生。而導致政變失敗的主因，中共內部的參考資料認為，主要是戈巴契夫多年來實行新思維，因而改變了蘇聯國內的政治形勢，加上策劃政變的主謀者採取的措施不當，「以合法的外衣，非法的手段」，是政變失敗的關鍵。^③

對蘇聯國內情勢未來可能發生的變化，中共中央的評估是：各種勢力間的鬥爭必然會繼續下去，局面會動盪不安，蘇聯有分裂的可能。蘇聯共黨領導人與反共勢力之間的鬥爭、戈巴契夫和葉爾欽之間的鬥爭、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鬥爭、各加盟共和國與中央政府之間的鬥爭，還會尖銳地進行下去。^④

準此以觀，中共內部文件的內容與中共領導階層的公開言論，顯有相當大的差距。在傳播媒體上依舊採愚民政策，儘量淡化處理，內部參考文件上，才有進一步的分析觀點。不過，從上述中共對蘇聯演變過程的看法觀之，北平當局顯然欠缺客觀，只見樹不見林。事實上，東歐與蘇聯的變化，乃肇因於共產主義教條的僵化，和共產黨官僚體系的特權壟斷，貪污腐敗已到無可救藥，才引起各種矛盾與動亂的併發症，決非戈巴契夫新思維改革的必然結果。相反地，戈氏的新思維不僅帶動蘇聯社會的動力，呈現一股活潑的新氣象，而且也成功地使東西方對抗長達四十多年的冷戰宣告落幕，對世界的和平起了積極的作用。

四、蘇聯變局對中國大陸的衝擊

蘇聯變局對中國大陸的衝擊，表面上看起來，誠如李鵬所說，「影響不大」。其實，中共內部的一些作為，仍然可以窺見其緊張的一面。根據相關資料指出，當莫斯科發生軍事政變時，以及政變流產後，鄧小平曾二度召見中共高層領導人會商因應對策，並提出所謂「二十四字方針」指示，即「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着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絕不當頭」。前三句乃針對蘇聯變局的應付方法，後三句為中共領導階層處事原則。^⑤中共政治局再依據鄧小平這些指示，召開政治局緊

註② 同註①。

註③ 同註①。

註④ 同註①。

註⑤ 同註①。

急會議。根據香港明報透露的消息，中共在九月廿四日及廿六日的會議中，作出「五項堅持，五項反對」決定，²⁶即：

- (一) 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反對多黨制。
- (二) 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反對軍隊參與政治。
- (三) 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反對議會制。
- (四) 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反對社會民主主義。
- (五) 堅持公有制為基礎的經濟法制；反對私有化。

另外，中共領導階層如江澤民、楊尚昆、李鵬等人，在公開場合一再聲明「改革」與「開放」的政策持續進行，不會受到蘇聯變化的影響。由此以觀，中共面對蘇聯急劇的變化，至少表現下列三點矛盾心態：

第一，改革政策與實際執行步調之間充分表露明顯的矛盾。中共一方面推行經濟改革，非得要借助西方的資本主義經驗不可（如科技資金和市場經濟機制之應用），但另一方面却害怕資產階級自由化在中國大陸蔓延。兩者之間的取捨，如何拿捏得恰當，實非中共領導階層的能力所及。

第二，開放政策與和平演變兩者之間的矛盾心態。中共當局為了突破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殺事件」以來的孤立，一方面宣稱，要繼續實行開放政策，但另一方面却對東歐國家與蘇聯的和平演變風潮，感到憂心忡忡。質言之，中共領導階層表面上高唱向世界開放，實際作為上，却不敢向內部開放，容許政治多元化，政策表裏不一，自相矛盾。

第三，什麼是「中國式社會主義」語焉不詳，概念模糊不清。事實上，歸根究柢，中共搞的那一套社會主義，就是抄襲蘇聯模式，與蘇聯和東歐國家的社會主義毫無二致。誠如方勵之所說，「科學就是科學」，「民主就是民主」，沒有什麼「中國式科學」和「中國式民主」。更沒有什麼「中國式社會主義」。中共當局刻意粉飾門面，強調「中國式社會主義」，顯然是作賊心虛，企圖誤導世人的注意力而已。

至於蘇聯的變局能對中國大陸產生多大程度的衝擊？這個答案不難從中共媒體的相關報導，找出具體的論證。茲歸納下列五方面分別陳述：

首先，就對中共本身直接的衝擊而言，最突出的當然是領導階層恐懼和平演變的嚴重威脅。本來東歐國家共黨政權的垮台，已經够北平當局感到困惑，如今做為世界共產黨的「老大哥」也抵擋不住民主洪流，奄奄一息，中共不免有唇亡齒寒之痛。因此，當莫斯科風雲變幻莫測時，中共領導階層頻頻聚會研商對策，還要勞駕已逾八十七高齡的鄧小平挖空心思，提供

註26 同註⑦。

錦囊妙計以資應變。其中北平當局連續採取某些不尋常的動作，正可佐證中共對和平演變的憂慮。諸如：其一，延後召開「八中全會」，主要原因可能有三，要不是擔心改革派與保守派的尖銳鬥爭，就是冷卻蘇聯變局所升高的溫度，預防「異化」。其二，加強對解放軍的控制。由於蘇聯紅軍在政變時的表現異乎尋常，並未聽命政變主謀者的指揮，使中共最高領導層愈感不放心。中共為防範於萬一，除了提出「堅持黨絕對領導軍隊，反對軍隊參與政治」的指令外，並對解放軍加強思想教育，要求軍隊要忠黨愛國，忠於社會主義。²⁷其三，強化思想理論寫作班的功能，尤其在媒體上，學校和軍隊要深化思想教育，以防止精神污染與資產階級意識的自由化。其四，宣佈取消中共高幹的隆重葬禮。由於胡耀邦葬禮的教訓深恐爾後民主運動再度假借高幹葬禮的舉行，而死灰復燃。²⁸

其次，就鼓舞大陸民心和少數民族的分離主義而言，中共領導人每逢「十、一」慶典總是會引用毛澤東的一句話，「中國的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是崎嶇的」。²⁹惟中國大陸人民則流傳一句反諷，「前途光明看不見，道路崎嶇走不完」。五〇年代中共一面倒向蘇聯時，中共也以「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自詡。然而，這句話倒是給中共這一幫人當頭棒喝，為之毛骨悚然。反觀大陸人民對蘇聯的變革，確是額手稱慶，真的期待「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之到來。其中少數民族的分離主義之抬頭，也頗引人側目。例如：其一，西藏人權與自治問題公開亮在檯面上，引起國際社會的關切。尤其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屢屢以西藏領袖身份，蒙獲不少國家總統的禮遇接見，而再度升高藏人的獨立自主運動。其二，內蒙和新疆的少數民族，也受到蘇聯少數民族爭自由爭獨立的鼓舞，蠢蠢欲動。九月間，英國獨立報記者希金斯(Andrew Higgins)就因報導內蒙多名異議分子被捕的消息，揭開大陸敏感地區的禁忌，而觸怒了北平當局，遭驅逐出境處分。³⁰其三，中共中下層黨工和黨員有另謀出路的傾向，紛紛要求轉業，從事新興企業的工作，他們深怕在和平演變後遭到整肅或算老帳的連累。

復次，就增強海外地區華人的民主信念和反共決心而言，過去海外華人以為中共統治中國大陸四十年，儘管它是以非法手段奪取政權，但中共有效控制大陸獲得上百個國家的承認，已是不爭的事實。況且，中共黨、政、軍一體，牢牢掌握所有政治資源，要改變中共政體談何容易。因此，五〇和六〇年代一批相當堅持反共的海外華人，後來都基於現實，逐漸投靠中共，或放棄反共鬥爭，對政治轉趨冷漠。可是，蘇聯發生快速變化後，海外華人又有一線曙光，再造「民主中國」，並非夢

註27 中國大陸研究，第三十四卷第十期，民國八十年十月，頁四〇五。

註28 人民日報，一九九一年十月十二日，第四版。

註29 人民日報，一九九一年十月一日，第一版。

註30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ept. 16, 1991, p.23.

想。最足以證明此項事實者：其一，九月在香港首次舉行直接選舉議員時，親共候選人全部落敗，而以追求民主為訴求的民主派候選人則囊括所有民選議席。這正顯示，這個地處中國大陸前門，原本對政治極端冷漠的英國殖民地，則因「六四天安門事件」和蘇聯變局，更增強其民主的信念和反共的決心。其二，流亡海外的大陸民運人士在十月一日中共「國慶日」當天，糾合旅歐藝術家、學者、留學生等知識份子於巴黎成立所謂「末日沙龍」，象徵中共的末日即將到來。同時，旅居巴黎的「民陣」也發表了「致中共黨員的公開信」，呼籲有良知有血性的中共黨員，勇敢的退出這個沾滿血腥，罪惡多端的「暴力集團」。^{③1}

又再其次，就海峽兩岸關係的衝擊而言，蘇聯的變局對台海兩岸的關係也出乎意料地增添新變數。本來海峽兩岸的關係有朝向正常化的趨勢，慢慢在建立一套良性的互動規範。但隨著蘇共的倒台，聯盟的解體，波羅的海三小國的宣佈主權獨立等一連串的事件發生，正給主張「台獨」份子有機可乘，而鼓舞了「台獨」聲浪的升高。主張「台獨」者正可振振有詞得到有力的論據，如「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等三國可以獲得莫斯科的認可，宣告獨立，並堂堂正正加入聯合國」、「台灣為何不能」；「波羅的海三小國反抗蘇共統治，鏗而不捨，終於實現」，「台灣為何不能」等等。無疑地，由於「台獨」聲浪公開化，非但向執政的國民黨挑戰，而且也讓北平當局找到藉口，借機恫嚇。在這種情況下，國民黨、中共和在野的民進黨之間針對「統獨」爭議的三角習題，很不容易建立共識，自然會使海峽兩岸本來就互不信任的關係，更蒙上一層陰影。有關此一問題，國內討論的文章甚多，在此不另贅述。

最後，就中共的對外關係而言，顯然地，莫斯科八月爆發的「地震」威力，對北平當權派最直接的傷害，應該算是「中共牌」的行情一落千丈，跌到谷底。六〇年代當中蘇共關係惡化時，由於蘇聯仍具擴張野心，對世界和平還存在著相當大的威脅性。因此，美國政壇乃出現打「中共牌」的構想，試圖藉機「聯中（共）制蘇」，使得七〇年代中（共）美關係有了很大的進展。如今，蘇聯的超級大國地位，因聯盟的解體和經濟發展每況愈下，其國力已大大地削弱。再者，美蘇之間加速裁軍進程，雙方合作日益密切，莫斯科已變成華府的伙伴，而不再是敵手。所以「中共牌」已失去其時代價值，形同廢紙。從莫斯科流產政變後，中共的國際關係多少予人有四面楚歌之感。茲舉二例為佐証：其一，美國不再如同七〇和八〇年代那樣，讓中共予取予求，對人權問題採雙重標準。九月以來，華府對中（共）美雙邊貿易的障礙，已敢直截了當正面指責，尤其對中共利用囚犯廉價勞力賺取外匯加以撻伐，毫不留情。^{③2}事實上，中共虐待囚犯的勾當，早有所聞，只是過去「中共牌」還有利用價值，能忍則忍。其二，歐洲國家政界領袖在蘇聯政變之後訪問北平時，已不再有所顧忌，直言不諱向中共當局表

註③1 歐洲日報（巴黎），一九九一年十月二日，第二版。

註③2 Der Spiegel, 7 Oktober 1991, pp. 230~237.

明對人權問題的關切。尤值得一提者，曾一度是中共同一陣營的波蘭，由議會議長率領的一個代表團於九月下旬訪問中國大陸。這個成員包括有昔日被波共經常壓迫的異議份子訪問團，更理直氣壯地要求北平當局在向世界開放的同時，也應開放監獄，釋放政治犯。^③蘇聯於九月初召開的「人代會」已正式通過「人權法案」，不再視「人權」為內政問題。一般威信，國際社會對中共的踐踏人權會有愈來愈大的壓力，北平政權不能充耳不聞，無動於衷。另外，由於社會主義政權紛紛倒塌，國際共運已走到窮途末路，目前僅剩中共、北韓、越南和古巴等四國還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因此，這個所謂「社會主義新四人幫」愈有形單影隻之感，陷入孤立。在惺惺相惜的情況下，九月和十月間，彼此間高層互訪極為明顯，似有聯手形成「社會主義軸心國」之勢，以抗拒民主潮流的侵襲。不過，古巴、越南和北韓已失去為數可觀的蘇聯奧援，當前中國大陸也百廢待舉，隻身難保，中共能填補蘇聯的作用嗎？很令人懷疑。

五、結 論

總的說來，蘇聯變局對中國大陸的影響，都具有正面和負面的意義。其正面意義，至少可歸納下列三點：

第一，民主改革是當代不可抗拒的潮流，無法迴避。蘇聯和東歐國家共黨政權最終也得要順應時勢，接受民主洗禮。此項歷史事實無異向中國人昭示，民主化畢竟也會在中國大陸開花結果。

第二，喚醒中國人民和中共改革派的覺悟。要長治久安，非得要建立民主政治不可，「一黨專政」的時代已成歷史，無可挽回。

第三，中共一再強調和堅持的「四項基本原則」和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已不具任何吸引力。人民關心的是現實問題，而不是遠在天邊，遙不可及的「烏托邦」空想。

不過，蘇聯變局多少對中國大陸產生負面的意義，即：

第一，中共唯恐遭殃，可能加緊控制內部，而放慢改革與開放的脚步。

第二，保守派深感人自危，有可能凝聚力量，統一口徑，整肅異己，愈顯頑固。

第三，西藏、內蒙和新疆等地區少數民族分離主義的抬頭，以及地方主義色彩有高漲傾向，這些潛在危機，都可能隨時發生，而影響政局的穩定性。

具體言之，蘇聯變革成敗與否，亦攸關中共的前途。換句話說，如果蘇聯的民主化進程在短期間內（三至五年）能持續穩定，彰顯績效。那麼，這種發展會更對中共不利；相反地，如果蘇聯未來幾年內依然動盪不安，乏善可陳，那麼，北平當局可能得意忘形，趾高氣揚地說，他們的路線是正確的。

但是，無論如何，當前中共潛存下列危機，是毋庸置疑的：其一，中共賴以維繫其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已宣告破產，人民不再相信這一套東西。其二，中共官僚體系為非作歹，貪污腐敗，人民普遍不滿，失去信任。其三，中共領導人的更迭問題，未來不可能出現強人足以掌控大局。其四、解放軍效忠共黨的程度，可能也會產生一些變化。今後，民主運動在大陸再度興起，解放軍會不會把槍口對準百姓，令人置疑。凡此種種因素的俱在，中國大陸的和平演變，只是時間問題，無法避免。

惟如何因應這種時機的來到，該是國人刻不容緩認真思考的重大課題。

*

*

*